

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的庐山会议，以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为界，分成前后两个阶段。在前一阶段，“秀才”们（指参与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的人，特别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）大都与积极促进“大跃进”的地方负责人发生了矛盾。

庐山会议“秀才”与地方领导针锋相对

田家英和李井泉

田家英自1948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，庐山会议时任中办副主任等职。

早在1959年春，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，到四川进行蹲点调查，掌握某个所谓“高产丰产”公社虚报产量的问题。不久，毛泽东写给六级干部的指示信下达，信中特别提到合理密植和要讲真话两条。但毛泽东的指示信被封锁，四川省没有在县级以下传达。田家英突破封锁，在蹲点公社广播了指示信。上庐山后，田家英把公社浮夸虚报产量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，引起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不快，两人发生争吵。在开小组会时，田家英谈到下面受压而虚报产量等问题时，组长李井泉批评了他。最后“官司”打到毛泽东那里，毛泽东没明确判定谁是谁非。

李锐和柯庆施

李锐自1958年初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，庐山会议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。在庐山，李锐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矛盾尖锐。据李锐回忆，1958年5月华东地区计划会议在上海召开，制订次年“跃进”计划，华东地区钢指标涨到600万吨。李锐泼了冷水，认为电力无法保证，令柯庆施很不满。

在此次的庐山会议上，李锐于7月20日的小组发言中特别提到：华东地区600万吨带头，远超客观可能。这些话应该说是针对华东地区的负责人柯庆施的。23日，毛泽东讲话后的两

三天里，会议形势急转直下。这期间，柯庆施曾在吃午饭时过来和李锐干杯。李锐大声说，柯老，你是见过列宁的人，何必跟我们后生小子过不去，并转回餐桌不予理会。

陈伯达和叶飞

陈伯达自1939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，庐山会议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。1959年一二月间，陈伯达回到家乡福建晋江地区，进行蹲点调查。2月26日，他写信并通过福建省报告中央和毛泽东。其中不乏一些正确意见，实际上是晋江地区干部、群众的呼声。这对于毛泽东继续纠“左”起了一定的参考作用。

在庐山会议前一阶段，陈伯达曾两次作长篇发言，批评“大跃进”中的一些弊端。他对福建的工作提出批评，和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发生了争论。7月23日后的小组会上，陈伯达受到批判，他去福建调查的事也被重新提起。

胡乔木和曾希圣

胡乔木自1941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，庐山会议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。他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对《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》的争论上。

按照原来的安排，会议开半个多月，通过一个会议纪要性的文件就结束了。文件起草小组成员，毛泽东原来指定5个人：胡乔木、杨尚昆、陈伯达、吴冷西、田家英。7月13日，毛泽东建议起草

小组增加陆定一、谭震林、陶鲁笳、李锐、曾希圣、周小舟，起草出《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》。从17日起，在讨论《议定记录》时，一些人有意见主要集中在胡乔木执笔的《关于形势和任务》上，认为对“大跃进”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表达得不够充分有力，缺点写得很具体，这样传下去要泄气。曾希圣对这一段写法不满意，他在19日的小组发言中说：“至于去年工农比例失调，我不承认……我的看法很乐观，不经过这样的大演习，我们受不到这样的教育。”

毛泽东的最终态度

在庐山上与“秀才”们发生纷争的不只是上述几个地方负责人，还有其他人。矛盾的存在，主要是由于“秀才”们对“大跃进”及纠“左”的看法跟一些地方负责人存在分歧。“秀才”们另一个坚持纠“左”的表现是对彭德怀、张闻天等表示了支持。反观一些地方负责人，特别是1958年热度较高、错误较严重的地负责人，面对“秀才”们积极主张纠“左”，起而反击。有人在23日后的批判中把“秀才”们与彭德怀并列，说他们一个鼻孔出气。

对毛泽东来说，一方是他身边的人，一方是“大跃进”的倚重力量，在纷争的前期，他没有轻易表态。但随着毛泽东转向批判彭德怀、“反右倾”，也就自然宣判了“秀才”一方的落败。李锐在会上即被淘汰出“秀才”行列，定为“反党集团成员”。其他几人也被中央立案审查。
（据《党史博览》）

王明妹妹改名换姓也难逃厄运

陈映民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，是大名鼎鼎的王明（原名陈绍禹）的胞妹。她经历过长征，又参加了西路军，死里逃生。而因为其兄王明和张国焘问题的双重连累，这个名字长期被历史的烟云尘封。

从童养媳到女红军

陈映民生于1913年，与其兄年龄相差近10岁。她出生时，大哥陈绍禹、大姐陈觉民、二哥陈绍伟，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。而陈映民出生后第7天，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人家，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。

1931年春，陈映民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。1932年10月，第四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。陈映民抱上她3岁的儿子吕美成，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，随军征战。途中，陈映民不慎丢失了孩子。随军入川后，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，并担任省委妇女部部长。1935年3月底4月初，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，到达甘肃境内

时，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。1936年10月，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的艰苦征战。西路军损失惨重，陈映民被俘后，被押解到青海省城西宁，在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做苦工。后来，陈映民在马步芳身边的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，逃了出来。几经颠沛流离，她返回到阔别5年的故乡。1937年末或1938年初，陈映民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，投奔陈绍禹。这时，陈绍禹早已改名叫王明，坐镇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。

改名王营受到连累

1938年4月间，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，恰是张国焘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，革命圣地再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。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，原西路军回来的人，都得经过政治审查。当时，陈映民也许是急于跟张国焘划清界限，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，于是改名换姓叫王营。但命运弄人，这次改名反而为她以后的悲剧埋下更大隐患。

在延安，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

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，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、出纳员、营业员。延安整风运动中，王明成了“左”、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，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。

“文革”期间第二任丈夫被整死

解放战争时期，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，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。1939年，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。“文革”期间，王营这一名字，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“铁证”。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，挨过批判斗争，家也被抄了。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，1971年被整死。不仅如此，“文革”中清理阶级队伍，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“叛徒”、“张国焘的走狗”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陈映民一家得以平反昭雪，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。更值得庆幸的是，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，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。母子团圆，骨肉相亲，皆大欢喜。
（据《党史博览》）

特别揭秘·秘闻

香城都市报 18

责任编辑：王奇峰

邮箱：421455329@qq.com

高岗之子高毅： 一生不得志

1948年，中央选派21名中央领导人和烈士的子女赴苏留学（被称为“4821”）。学成回国后，“4821”在新中国建设中担当重任，成为各领域的领军人物。当然也有个别例外，高岗之子高毅就是其中之一。

没毕业就被分配到工厂

高岗与前妻杨芝芳有两个孩子，大儿子3岁时因病死于延安。高毅是次子，1930年出生。高毅在1938年成为“高干子弟”之前，与母亲杨芝芳一起给地主家打工好长时间。

当年高岗和刘志丹在外闹革命时，妻子和儿子在老家差点被地主卖掉，幸亏高毅的舅舅得知，想法让他们母子逃走。陕甘宁根据地建立以后，高岗才找到了他们。1939年，高毅和陈昌浩之子陈祖涛，陈伯达之子陈小达，刘少奇子女刘允斌、刘爱琴以及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等一起去了苏联。1951年年底，按高岗的意愿，高毅进入培养高级人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机械。这时，高毅结识了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化学系学生宋丽达，二人很快结了婚。但后来因为高岗的事，还没毕业，高毅就被分配到哈尔滨120工厂工作。

被定为“反革命集团”头子

1960年，为照顾母亲杨芝芳，高毅全家从哈尔滨迁到西安，和妻子一起在430厂做技术员。“文革”期间，高毅被定了个以他为首的“反革命集团”的罪名，送到咸阳纺织器械厂隔离审查。“4821”这些留苏学生在“文革”中，曾以“苏联间谍”之名受到迫害。而高毅既是“间谍”，又是“反党集团”首脑之子；既“要为老子翻案”，同时自己还是一个“反革命集团”头子，势必会受到更大更重的打击。幸运的是，他和妻子被好心的工友们保护了起来。

受父亲牵连一生郁郁不得志

然而，由于受父亲问题的牵连，高毅一生郁郁不得志。1979年经王震批示，高毅才调回北京，在市科委电加工研究所从事机床研究，最后以一个高级工程师的身份离职休养。

高毅的“4821”同学在他最困难的时候，仍保持着兄弟姐妹一样的友谊。而令高毅感慨的是，1939年与他一同前往苏联的6个孩子中，有3个都英年早逝。陈小达因工作、婚姻受到挫折无人交流，26岁卧轨自杀；刘允斌在“文革”中不堪凌辱，42岁时也卧轨身亡；孙维世则被关进监狱，活活打死，年仅47岁。

（据《文史博览》、《高岗传》）